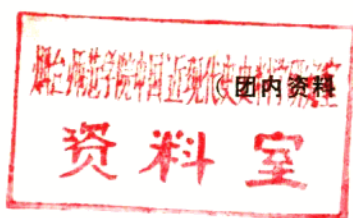


11



(注意保存)

浙江省青年运动史研究参考资料

第 三 辑

共青团浙江省委青运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3
Anty/1989/0803

目 录

宁波早期的学生运动.....	王安卿 (1)
关于宁波一中在“五卅”前后党、团活动的若干回忆	史 永 (4)
“五卅”浪潮中的宁波学生运动	陈修良 (7)
北伐前夕宁波学生“拥经亨颐”的斗争	周闪耀 (13)
杭州“五卅”运动及其影响.....	于 渊 (16)
“五卅”惨案发生后杭州反帝浪潮的掀起.....	赵子劭 (23)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奉化 ——纪念赵济猛、王任叔、董子兴同志.....	纪 杰 汪成法 裘熙旸 (25)

青年英烈

浙江青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张秋人	叶炳南 (30)
关于恽代英同志来宁波的回忆	刘沧海 (39)
龙泉县青年运动概要.....	朱宋林整理 (39)
二、三十年代舟山青年革命斗争运动概况.....	黄建钢 黄 彪 (43)
《浙江省青年运动史资料征集、研究范围》	共青团浙江省委青运史资料征集组 (47)

宁波早期的学生革命运动

王安卿

宁波学生运动是有悠久历史的，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崭露头角，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上街演讲、抵制日货，有很大成绩。

五四运动以后，学联合会的工作仅限于各种爱国纪念活动，各校学生会也没有什么活动，可以说，有一段时期，学生运动曾处于消沉状态。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宁波开始建立党团组织，出版了一种半公开刊物，好象是叫《玫瑰》，在各校学生中传阅，起了很好作用。这时，各校学生相继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学生自治会（如四中），有的叫学生协进会（如四明中学）。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发生，促成了学生组织的统一，各校在接到四中学生自治会发出的开会通知后，即派代表到后乐园（现中山公园）前面的一所小学里开会。出席会议的除学生团体外，还有市商会、救国十人团、时事公报馆、四明日报馆等代表，当场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但在这次会上却发生了斗争，学生们主张罢市、罢课，市商会反对罢市，双方争执不下。会后，学生们在上海学联合会赴甬代表贺威圣、干翔青带领下，包围了市商会，交涉直至深夜，市商会会长俞佐庭迫于无奈，应允在开“五卅”惨案纪念大会这天，罢市一天。

经过这次行动，使学生们感到有统一组织领导之必要，于是，很快地在党的领导下，重建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学生会又成立了，但在确定会长一职时却发生了争执，就当时来讲，四中人数多，影响也较大，会长一职理应由四中担任，但效实中学（当时是

宁波国家主义派大本营）坚决反对，最后以四明中学孙鸿湘为会长，四中裘古怀为付会长，以此作为缓冲，并议定各校推荐代表二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学联合会中还设文书、财务、组织、宣传等职，分别由女师、女中、效实中学、甬江女中等校派代表兼任。当时各校参加学联合会的代表大致如下：四明中学孙鸿湘、甘汉光、王安卿、汪孝铭、夏锡类、周曹裔；四明初中部左孝维、杨志伟、孙昭方；四中裘古怀、华少峰（华岗）、李宪仲、陈鸿、康有川、沃醒华、张明贤；四中分部沙文威（史永）、张令谦、虞一鸣、胡世杰、金绍勤（金文农）、曹声洪、沈孝绩；甬江女中徐诚美（徐镜平）、张赛英、范博理、李秀清（李汉辅）、苏云梅，启明女中冯永叔、杨理卿、杨安卿、陈逸僧、倪慧因、郭因明、金羽群；女师陈逸仙（陈修良），效实李伟民、来元义、洪复礼；甲商学校沙文汉、倪毓水、杨振雄；民强中学庄启东等，为了加强对学生的领导，宁波党还在学联合会中设立了党组，由孙鸿湘为书记。

当时，上海区党委对宁波学运十分关心，特派张秋人同志来甬指导工作。

学联合会成立后，首先需要有一个会所，当时后乐园有一所洋楼空着，外面挂一块“宁波参事会”的牌子，里面只有一个办事员而且无事可做。我们就和他们商量，商量无效后，我们就不顾一切，自行占用，这样，会所问题就解决了。

学联合会当时的工作有以下几方面：

一、组织“五、卅”惨案纪念大会。参

加大会的有全市中学生、小学生、商店店员。会后游行，声势浩大，沿途由各校童子军维持秩序，队伍沿途高呼口号，群情振奋。以后在沙基惨案纪念会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精神。在这二次纪念会中，宁波的工人队伍，初次登上政治舞台，和丰纱厂和铁路工人都参加示威游行。反动军阀怕出事故，派军警沿途弹压，可是军警一经学生们宣传，也激发了爱国心，和学生们一起高呼反帝口号。

二、派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会议。在产生代表的过程中，党组织经过考虑，决定派四明中学韩光汉（团员）、效实中学来元义（当时镇海炮台司令来伟良之子，无政治派别）为代表，到上海参加大会。

三、加强组织工作。当时宁波几个教会学校对学生们管得很严，学生中没有组织，可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们自发地起来，要求参加学生运动。如斐迪学校是英国人办的，英国校长自然反对学生参加反英斗争。经过学生们的斗争和学联会的声援，校方才被迫同意派代表参加学联会组织。但没几天，校方突然宣布提前放假，强迫学生回家。又如美国教会办的仁德女中，当我们游行队伍途经该校门口时，校方将大门紧紧闭住，里面学生只能隔着栅栏往外张望，热望能参加游行。目睹此情此景，游行的学生队伍，怒不可遏，一些学生翻墙入内，把校门打开，里面的学生无不兴高采烈，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吓得美籍女校长连连举起挂在胸前的十字架，大划十字，表示向上帝控诉。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学联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扩大了，连华美医院附属护校也推派代表来参加学联会组织。此外，又通过卓兰芳、陈国泳、张天一、林铎等同志领导的小教联合会和各小学学生联盟，通过王任权、石愈白、郭静塘、陈应仁的关系同奉化、余

姚、定海等地的学生建立了联盟。

四、进行宣传募捐。宣传募捐运动不但在宁波本市，而且波及到镇海、余姚、慈溪、奉化等县。宣传的形式：短剧、四季调、顺口流等多种形式，中间夹以简短演说，尽管很简单，却很动人。募捐基本上采取一种形式，用一个毛竹筒，两端封闭，旁开一小口，捐款由出款人自动投入，到时当众开启，以防作弊。募捐成绩很好，除货币外，还有不少饰物，全部汇缴到上海各界人民联合会，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五、厉行经济绝交斗争。宁波学生联合会一面每天派学生队伍到轮埠检查英日货，一面每夜派人到屠宰场了解牛肉供应情况，以防牛肉运往上海。并且，对专做外侨生意的陈筱宝的伙食店进行监视，同时劝阻店主陈筱宝与英商断绝往来，但陈筱宝唯利是图，表面上应承爱国怎肯后人，暗地里却照常供应。激起附近市民的公愤，在一天晚上，冲进店内把其货物打得稀烂，并把挂在店内的一幅陈筱宝照片写上奸商字样，次日，抬着游街。

六、协助工人组织工会。宁波工人虽在“五·卅”运动中初次踏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自己的组织，只是基于爱国心的自发行动。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决定由学联会出面加以协助，学联会就派陈鸿、赵士俊（女）负责这项工作，李秀清、王安卿、汪孝铭等及小学教师卓兰芳、林铎等也参与了这些工作。我们先以和丰纱厂为对象。和丰纱厂有条渡船和江北岸交通，工人上下班一般都在那里搭船，为了便于联系，陈鸿他们设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泗洲塘工业学校，另一个在江北岸余使君庙小学。此外，又协助正大火柴厂、铁路工人、邮局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均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当然，学联会所进行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斗争的。

首先，必须和各校封建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当时各校行政当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以四中校长经亨颐为代表的，同情和赞助学生爱国运动，这是第一种；以效实中学李琯卿、陈训慈（陈叔谅）为代表的，表面同情学生运动，实质想把学生运动拉入国家主义派轨道以及以女师施竹晨为代表的，主张学生不参加政治运动，埋头读书，这是第二种；以工业学校、甲商学校的王思成、董贞柯为代表的，具有政客、市侩习气，说话吞吐，行动躲闪。以四明学校樊正康为代表的，维护美帝国主义利益，因当时爱国运动矛头直指英、日，与美帝利益无直接关系，而佯装中立。这是第三种。

当时王思成曾召开各校教师会议，认为爱国运动主要应由成年人担负起来，不应全部放在青年学生身上，以免妨碍学业。他们一面发起组织中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参加爱国运动；一边劝令学生复课，以此来扼杀爱国运动，各校学生一致反对。他们见此招不行，又换一招，强制学生参加学期考试，对毕业班同学以不参加考试者不发给毕业证书相威胁，结果，发生了女师开除拒考学生陈逸仙、方守娣、张宜文、冯俞相等五人事件。各校学生闻讯集结包围女师支援，校长施竹晨竟宣布放假，强迫学生离校。开除时，地方当局由道尹（相当于专员）亲自挂牌，还派了保安队弹压学生。

其次，学联会和一部分奸商的斗争。宁波是一个通商港口，英、日货集散数量很多，学联会检查英、日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多方阻挠，甚至在轮埠上同学生们发生纠纷。陈筱宝照片游行后，他们竟组织力量，向学联会提出质问，要求赔偿名誉损失。

再则，学联会须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宁波是国家主义派重要基地之一，《四明日报》主笔李琯卿、《时事公报》陈杏荪、

效实中学教师陈训慈都是该派中坚分子，他们创办刊物，与上海曹琦、李璜等所办的《醒狮》遥相呼应。效实中学部分学生受了国家主义派的影响，在学联会里时常扮演反派角色，诬蔑学联会“赤化”，多次以退出学联相威胁。我们一面向这部分学生耐心解释，以巩固内部团结，一面向国家主义派进行反击。恰巧，当时一只日本船据说在海上遇到风浪，驶入宁波白沙，李琯卿恐怕学生行动过火，有碍中日邦交，就偷偷地下船去，叫他们赶快驶离，并资助他们很多食物。学联会知此消息后，就组织学生向李质问，李虽再三狡辩，也无济于事，结果，李被开除了“宁波五卅惨案后援会”委员的职务，这给国家主义派是一个狠狠的打击。

另一方面学联会比较注意统战工作，以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宁波当时比较进步的士绅和工商界人士如金臻庠、金梦麟、张申之、张葆麟、陈企白、胡叔田、王大猷等均同学联会建立了联系。王大猷是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宁波分公司经理，因抵制英货与他营业有利，为表示赞助学生运动，主动捐助五百元作为学联会经费。

暑假到了，学联工作不能停顿，议决派王安卿、裘古怀、陈逸仙、杨理卿、汪孝铭等，留甬担任联络工作。

以后，学生运动转入积蓄力量的时期，各校相继成立了团的组织，教育和培养了大批青年，先后参加革命工作：如四中的华少锋、李宪仲、裘古怀、康有川、沃醒华、谢广祥、张其鹿、陈鸿、张明贤、吴雄等；四中分部的有沙文威、沈孝绩、虞一鸣、胡世杰、金绍勉、曹声洪等；四明中学有孙鸿湘、芦于舫、甘汉光、王安卿、马吉良、汪孝铭、樊正康、邹枋、周曹裔、陈应仁等；四明初中部有左孝维、杨志伟、孔昭方等；甬江女中有徐诚美、李秀清、张赛英、樊英、

（下转第24页）

关于宁波一中在五卅前后党、团活动的若干回忆

史 永

(一)

一九二三年以前，宁波一中当时叫做省立四中，是宁波一所闹风潮著名的学校。那时间，四中的学生运动没有正确的领导，往往都是自发性的。诸如闹饭堂、打校长、反对贪污腐化的学校当局等。在二三年上半年的一次风潮中，学生们把当时的王校长赶跑了，并打坏了宿舍里的所有电灯。从中足以反映出学生们不满现状，反对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也弄得宁波当时的学阀们没有办法。因此，浙江省教育厅只好派德高望重的经亨颐来宁波担任四中校长。

经亨颐来四中任校长时，带来了一批主张赞同新文化运动的教师。如朱自清、夏丏尊和几个有自然科学修养的教师。经亨颐就请用这些教师向学生们灌输新文化新思潮。同时，整顿校纪、纠正学风，使学校的教育秩序很快趋于正常，学生风气逐渐好转。但是，这种新学风与整个宁波的旧学风却尖锐地对立起来。何谓旧学风，就是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旧文化，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而新文化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当时宁波的旧文化还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尊孔。”“颂孟”那一套，连白话文也被各中学所禁止。经亨颐来四中后，特别是五卅运动的兴起，宁波的资产阶级、封建绅士和地方学阀们，开始预感到宁波四中学生所传播的新文化思潮已经影响到整个知识界和他们的下

一代，就千方百计起来反对，咒骂诬蔑四中是宣传“共产”、“公妻”、“赤化”、“过激”（这些都是当时他们诬蔑社会主义的名词）的学校，宁波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洪兆麟（四中国文教师），就到处散布说“经子渊（经亨颐的号）把马克思请进来了”！还叫嚷“什么马克思、牛克思，阿拉宁波人不要这种东西”。

(二)

经亨颐，早年留学日本。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也主张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时，他正担任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该校学生高举“民主”、“科学”，“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上街游行示威，发生了殴打省议会事件，引起浙江守旧派的反对，他因此去职。二三年他来四中时，带来了二个学生，一个李宪仲，一个华少峰。他们俩在外地已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二四年又聘请了一位叫华林的教师（原是杭州第一师范学生，当时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是共产党员）。于是，党和团的组织就很快在学校内发展起来，当时参加党和团的除李宪仲、华少峰外，又先后发展了二十余人入团入党，这些党团员始终站在宁波学运的前列，在当时宁波五卅运动中起了很好作用。

那时，党同经亨颐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列宁逝世后，党通过经亨颐发起召开列宁追悼会，向宁波知识界介绍列宁，介绍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当时北洋军阀当权，共产党员多加入

国民党，国民党也是地下党）。经亨颐先后邀请了吴稚晖、胡汉民、戴季陶、沈定一等到四中和向宁波知识界演讲（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右派，可在当时还是拥护孙中山的）。党还以学生会名义邀请了当时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同志来四中作公开演讲。学生李宪仲等发起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经亨颐加以赞助，他们曾通过上海书店出版一本《社会科学研究集》，作者多是四中学生。另外，李宪仲等还办了一个《四中周刊》（油印刊物）。记得当时有一位教师曾对经亨颐讲：“宁波已有人指责你是赤化校长了！”经亨颐听后却说：“这并不冤枉，我的学生思想新。”这说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可以联合起来的。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经亨颐曾同蒋介石闹翻。“九一八”事变后，经亨颐主张国民党应该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抗战初期，他病逝于上海。

（三）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正当四中高初中和师范科学生准备前往上海。南京等地旅行时，突然传来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南京路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消息，上海全市已经罢工、罢课、罢市，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时，全校师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大家早把旅行的事置之脑后，你一伙，我一伙地议论起来，连老师们也参加了进来。很自然就形成了全校性的罢课。

第二天，宁波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四中参加学联合会的代表有华少峰、裘古怀、沙文威等。此后，全市性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就开始了，四中学生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向市民们宣传，并深入到宁波四乡包括奉化、慈溪、定海及各集镇进行宣传，还

向群众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在当时一向同外界隔绝的教会学校，如三一中学、崇德女中、斐迪中学等，闭关的大门也打开了，连宁波的工商业者也参加了运动，个别的民族资本家还出钱资助学生办爱国刊物。

针对这一有利形势，党指示我们要通过这一运动广泛发动各界人民，特别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物色积极分子，相机组织工会。陈鸿同志和我具体从事这项工作。陈鸿同志是个急性人，往往没谈上几句就问工人：

“你们为什么不罢工”？常常使对方难以回答。我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同工人接触时，也满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讲个不停，结果效果不好。以后经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必须学习工人的语言，用他们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亲身经历来引导他们、启发他们觉悟，这样才慢慢地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对于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工人，我们在谈话中则取其共同点进行工作。如有的工人讲：“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我也反对，但是上帝反不得！”我们就讲：“信教的人很多，我的朋友也有信教的。”主动地回避这个问题，使谈话能继续下去。尽管我们碰了不少壁，可还是团结了一些工人，为开展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

宁波当时的一些国家主义派分子是革命的死敌之一。当五卅运动兴起时，他们百般诽谤和诬蔑，提出什么“内治国贼，外抗强权”，说什么要先反对共产党，因为他们动员工人、学生示威游行，因此被外国人杀了。妄图给帝国主义分子开脱罪责。当革命人民奋起反抗时，他们又认为是大逆不道，横加阻挠。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这种衣钵就为国民党所接替了。

（四）

五卅运动后，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和工作

的需要，党决定抽调四中一批骨干。这年七月，华少峰同学被调往南京负责团的工作，陈鸿同学于十月调往上海搞青年工人运动（一年后又调回甬），与此同时，李宪仲、胡世杰同学也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动员袁古怀、虞一鸣同学投笔从戎，前往广东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袁古怀，在四中求学是国民党员，入黄埔军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调金绍勋于二六年上半年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即毛泽东同志创办的农讲所），同年，又调吴德元、陈良义等回家乡从事革命工作。自从这批骨干调走后，党和团在四中的力量暂时单薄起来，我们又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使党团组织在学校里仍能发挥作用。这里我不禁想起袁古怀、虞一鸣同志，当时他们从黄埔军校写信给我，大意讲：“我们都离开了，你要坚持革命斗争。北伐即将开始，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这些话我都牢记在心头。可惜，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

二五年六月宁波的学阀向军阀孙传芳指控经亨颐宣传“共产”、“公妻”，孙传芳下令撤去经亨颐四中校长职务，省教育厅慑于经亨颐在学生中的威望，暂时不宣布。这样便发生了“反经”、“拥经”的斗争，党决定开展拥经运动。这一运动实质上就是宁波文化教育界的民主思想与封建买办思想的斗争。暑期中，党交给我们一篇《宁波人为什么反对经亨颐》的文章，把反动学阀洪兆麟、冯纯官等及其幕后人，作了比较深刻的剖析。我们以刊物形式发行到各阶层，大大鼓舞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拥经运动，当然也引起了这批老畜生的恐慌和恼怒，其中冯纯官就向宁波地方法院起诉。

在这场历时一年的拥经运动中，我们注意到反动势力大，当时学生中以张锡伟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分子是坚决反对经亨颐的，教员中林本乔等人是两面派，事实上他是在与

国家主义派拉关系，介绍陈启天等来四中演讲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学校中大多数教员、学生是拥护经亨颐的，我们既注意依靠群众大多数，又不忘团结争取中间分子，如学生中的吴诩（现名吴力生，日本文学翻译家）、楼浚等人，这样做就在最大限度上团结了大多数人，因而能够多次挫败国家主义派分子的进攻。二五年下半年，省教育厅为了缓和局势，派了一个姓范的老人来做四中代理校长，给学生们赶了回去。二六年春开学时，又派了有国家主义派观点的科学家陈世觉来做校长（他原是东南大学物理教授），由于他的学术地位较高，又带来一批东南大学教员，如赵步霞、金海观等人，介雇了一批比较开明的教师，加上我们对黎明前的黑暗形势估计不足，事先也没有在学生中做好工作。因此，在新校长来校的开学典礼上，吴诩同学凭着个人热情发表了一篇反对陈世觉任校长的演说，在这种场合下，同学们没有思想准备，虽然拍手响应者不少，可是当大的压力来时，我们就失败了，吴诩同学被开除了学籍。

当时，陈世觉怀疑我是学生中的负责人，就试探性地找我谈话，他假仁假义地说：“我十分关心同学们的学业，我在计算每一个同学的学业，罢课会引起几百人荒废学业，这怎么叫我安心呢？”我回答他：“我也注意到同学的学业，包括我自己。但你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有多大！我坚持主张读书毋忘救国”。他听后假惺惺地对我这一精神表示钦佩。可过后，却又派辅导主任金海观找我谈心了，金旁敲侧击地问：“你最近课余在读什么书呀？”我告诉他正在读一本介绍欧洲各派哲学的书。他接着问：“这么说，你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罗？”我说：“是的。”他听后以老师的面孔规劝我说：“能多读书自然很好，马克思主义仅

（下转第16页）

“五卅”浪潮中的宁波学生运动

陈修良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震动了全世界，引起全国人民空前团结，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五卅”运动。这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而发生的，它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序幕。宁波是帝国主义者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迫开放的五口通商之一的港口。宁波的人民一向具有反帝爱国的历史传统。上海五月卅日英帝国主义者在南京路枪杀我爱国学生与工人，激起了宁波各界人士的愤慨，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应最强烈，最勇敢。宁波的女学生也冲出了中世纪式的学校与教室，奔上街头同男同学们并肩作战，投身于革命的洪流。我是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中的一个积极参加者，目睹了我们是怎样与各种敌人斗争，而又怎样被镇压下去的。这里我要叙述的仅限于我所目击的、亲身经历的情景。我相信从一个不很大的城市中所发生的群众革命的历史，可以当作一个典型来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卅”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群众运动的规律，党与团的领导作用，斗争的策略问题等。回顾这段历史，总结一下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有益的吧！

一、大革命浪潮的前奏曲

“五卅”运动前夜，一九二五年三月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联合发动各界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在这次行动中形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那时宁波的国共两党都是“地下党”，统治者是

军阀政府和地方官僚。宁波市由道尹公署管辖，道尹老爷出来还坐绿呢大轿，气派很象清朝的大官出门。地方上的行政、司法机关十分腐败，学校当局掌握在封建反动的腐儒之手，如宁波女师的校长施竹展，或士绅兼“教育家”的效实中学教师冯纯官，李琯卿之流。教会学校不用说是被洋奴们所包办，他们办学目的是培养帝国主义的走卒。

一九二四年发生过一次江浙两省的军阀混战，宁波的女学校被迫停课，女学生多避居乡村，怕被“北佬儿”（即南下的北方官兵）奸污，所以逃避一空。那时我正在宁波女师肄业，这场内战震动极大，也不免随人逃难，我非常憎恶军阀与地方的官员们，他们鱼肉人民，争夺地盘，我开始想要推翻这个反动的统治者，但还不懂得政治制度问题，我只看到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卢永祥，孙传芳，互相攻击，通电声讨，一会儿这个上台，一会儿那个下野，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十分可恶。一九二五年三月间我第一次参加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群众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的旗帜，心情十分激动。那时宁波市已有党与团的活动，可以买到“中国青年”“响导”等党所办的革命刊物，我很快被革命的理论所吸引，尽可能去找新书看，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最通俗的共产主义理论。对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因为洋溢着爱国情调，被我所欣赏。我的姊姊陈逸僧在宁波办办的启明女校肄业，已经入团，她给我拿来新的进步书

刊，我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我开始寻找革命的出路了。

女子师范是宁波一所最封建、落后的官办女校，学校当局尊孔读经，提倡三从四德，甚至禁止学生与男教师来往。“五卅”前夜，我们女同学中已有少数人阅读新的书刊，如上海出版的学生读物。我们经常私自研究社会问题，特别关于妇女问题。我们讥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伦理，后来我们又进而研究时事，阅读报纸的消息。“五卅”运动爆发后，师生之间尊卑有别、一团和气之风为之一变。第一次冲突就是为了参加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女师同学为了参加游行，集中在教室里写标语口号，学监、舍监带着不愉快的注视，严加监视，他们看到旗帜上写了“打倒军阀”的口号，显得惊惶不安，当我们拿起旗帜要出校门去游行时，校长就勒令校工关起了大门，不许外出，可是我们发现倒粪桶的后门可以出入，于是一个个溜出去，学校当局只好徒唤奈何。

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引起了宁波政治上的波动，打破了多年的沉闷空气，实际上成了大革命的前奏曲，这次运动是党领导的，对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暴风雨，起了不可言喻的巨大推动作用，显示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威力，是多么伟大啊！

二、冲破黑暗，秀才造反

“五卅”惨案消息很快传遍了宁波城，女师同学一致愤恨帝国主义者在我国领土上公然屠杀自己的同胞，激动了爱国心。久已名存实亡的宁波学生联合会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收到学联一封公函，发来惨案的消息，要求全市学生一致行动，参加宁波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首先发动的是第四中学与启明女中。四中有党与团的组织，如党员华岗（即华少

峰）、李宪仲等，发起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启明女校是党办的学校，教职员中有杨眉山，~~潘念之~~，蒋本藩等均是党员，学生中也已经有团的组织。启明女校实际上是党团活动的一个据点，宁波地委许多会议在这里召开，策动革命的行动。

宁波有几所教会中学，即四明、启迪、崇德、三一中学，甬江女校，崇德女校等，其中以甬江、四明的团员最多，参加“五卅”运动也最早。一九二四年党中央发起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宣传封建迷信、麻痹被压迫民族的斗志。“五卅”运动发生后，张秋人同志从上海到宁波组织学生会，发动各界人民组织外交后援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犯我国的权利。张秋人同志通过宁波反基督教同盟，发动各教会学校的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甬江与崇德女校的学校当局竭力阻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正当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和军阀共同勾结残酷镇压之时，学校的反动教师竟然厚颜无耻为学生祈祷说：“上帝啊！我们要感谢你，一般中国人民在外困苦奔走，而我们却能这样的平安、快乐，真是幸福啊！”学生们懂得上帝所保护的正是当时帝国主义派来的美籍教师和死心塌地作洋奴的中国教师，广大学生连爱国的自由也没有，那里有什么“幸福”？他们情愿不要毕业文凭，停课支援“五卅”惨案。后来学生被当局禁止活动，只好离校，在他们庄严的离校宣言上写道：“我们这次离校是为了实行收回教育权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二十年代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竟能发出这样有觉悟的呼声，说明秀才们起来造反，是真正接受了党的反帝主张。崇德女校也因为有党与团的组织，一致起来反对奴化教育，作了离校的行动，其中有的团员在离校后，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

我的母校——女师，情况更糟，封建压

迫十分严重，女学生非但没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连通讯自由也没有。学校当局可以公开拆学生的书信，如发现有谈情说爱的，便视为大逆不道。星期日回家要由家长陪同，不许个人行动，并且不许穿红袜子、花鞋子，只能打扮成老太太模样，目的是要把活泼的女青年变成心如枯井的小寡妇，用封建道德束缚女学生。可是受过“五四”运动教育的女青年，思想已经有所改变，先进者非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要求自由救国了。“五卅”运动成了妇女解放的先声，在修道院一样的女师内，也爆发了革命，女学生也要起来造反动派的反了。“五卅”运动一发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歌声立即响遍了校园。六月二日，我们立即成立学生会，选举我任会长，出席宁波学生联合会，在学联的会议上，我第一次看到张秋人同志以全国学联的代表名义出席了宁波学联。他激昂慷慨地报告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痛论中华民族的危机及中国青年拯救祖国的光荣职责。会议决定以学校为单位民主选举各校分工负责的职务。学生会的主席是第四中学，四明中学。裘古怀、华少峰、李宪仲等主持过会议。四明中学的王安卿、孙鸿湘等也轮流作过主席，主持学联的会议。女师担任文书，负责会议记录，起草文件。其他学校的分工，已记不清楚。反正大家都有工作，经常轮换新人，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我记得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学生会经常要接待各界人士，清静的后乐园，一下变成青年人革命的活动场所了。宁波学联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因为他已成为“五卅”运动中实际中心。宁波的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的骨干是革命的学生——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那样落后的经济与文化的社会里，没有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中国革命是很难成功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往往是先知先觉者，反

帝反封建运动中总是站在最前列的；知识分子在巨大的爱国运动中，最能显示出中山先生说的“唤起民众”的作用。宁波学生在学联的领导下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工作。我们进行过好几次盛大游行示威，学生、工人和各界人士首先在小教场集合，手执旗帜，上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在这二个口号下发动了千千万万的群众。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呼着口号，走到英国领事馆大门外时，英国领事下令紧闭大门，被英国人雇用的中国工人自动辞职不干，表示抗议，弄得洋人吃饭也发生了问题，纷纷离开宁波。学生群众，三三五五组成小分队，一方面进入深院大宅、大街小巷进行爱国宣传，即席演说或散发传单；一方面进行募捐，支援上海罢工的工人们。女学生抛头露面奔走街坊，声嘶力竭去作宣传，这是旷古以来在宁波这个落后的城市，恐怕还是第一次的新事。人们奔走相告传为佳话。随着广州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宁波学联发出号召，实行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并发出长期罢课的号召。各界人民组织了经济绝交委员会，实行不买洋货，不卖东西给洋人，不给洋人劳动，拒绝教会的奴化教育，迫使教会学校停课，或解散学校。学联还组织了查禁日货的小分队，到各大商店去查禁洋货。

经济绝交问题，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影响很大，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充分地表示了他们的两面性。他们喜的是国货可以畅销，独占国内市场，忧的是不能代销外国货，捞不到商业利润。宁波是五口通商之一的商业城市，商业资本家这种矛盾心理，在李琯卿的国家主义派的政治主张中得到充分的说明，他一只手持着反帝的旗帜，另一只手去偷偷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商船船长握手，归根到底经济绝交如果真正实行起来，表示坚决反对的，

当然是商业资本家。因此反帝的统一战线中，给我们提出了政策问题。宁波的日常用品多是英、日货，一经查抄，商人就非常恐慌与仇视，他们同爱国学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学生一片丹心想救国，商人们一心至致于发财。国家民族利益与金钱收入，两者之间的轻重，不用说他们是金钱至上，矛盾到了最尖锐的地步时，他们当然要依靠地方的军阀、军警、官僚、士绅之权势，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这样的冲突，几乎每天每地都有发生。国家主义派利用他们的“师长”的地位出来大喊大叫“罢课是自杀”，“读书就是救国”，诬蔑学生是“赤化分子”，“过激派”。他们首先煽动效实中学的部分国家主义派学生复课，他们多次号召各校学生退出学联，实行分裂。学联为了对各校同学进行爱国教育，防止分裂，和他们进行公开的辩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所谓爱国主张。参加辩论的不但有学生，也有各校的教师，如国家主义派，他们是最积极反对学生罢课的。当时我们党尚在幼年时代，对于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自然还未能提到理论上去认识，对此也并无明确有效的政策，至于群众，当然更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群众只知道商人唯利是图的可恶，很少想到统一战线的一面，因此还是不顾商人与国家主义派的猛烈反攻，偏偏要去焚毁洋货，骂商人为“奸商”，这样“五卅”运动开始形成的团结，又重新分裂，运动就不力了。首先在学生中也引起了大分化，同学中有不少出身于当权的军警、官僚、资本家、地主的家庭，他们同家庭的父母一致，对“五卅”爱国热忱，逐步淡却，和学联关系日益疏远，有的甚至转向国家主义派。他们或明或暗，或早或迟地纷纷回家不干，在暑假中留校学生更加寥寥无几了。革命的，爱国的学生，陷于孤立。这种形势的发展，当然大大有利于反动派。

宁波学联的活动另一个显著的成效是：号召同学下乡宣传，并及时地组织了一些农民协会的团体。奉化、鄞县、慈溪、余姚等宁波四围的村镇展开了爱国宣传工作，对以后开展浙东的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有许多学生，参加党团，有不少人参加了农民运动，其中有卓兰芳、竺清旦、沙文汉等等，他们的一生都表现了非常的英勇斗争，不惜以身殉国。这些同志是中国人民中的优秀儿女，他们的英名是不会埋没的。另外，学联还分配一部分同学去进行工人运动，初步在宁波各大工厂、企业中建立起工会组织，后来还成立了总工会。例如学联派四中的陈鸿，启明的赵士俊，四明的王安卿、汪孝铭等去进行工人运动。首先是从和丰纱厂入手，后来又协助正大火柴厂、铁路工人、邮局工人、米业等店员工人，建立了工会组织，这是宁波最早一代的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了伟大的第一次大革命。工人群众的领袖王鲲、杨眉山烈士，在“四一二”后英勇地在宁波被刽子手斩首牺牲了，他们的英名与可歌可泣的历史，是永垂不朽的。

在这样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我始终坚持在宁波学联的工作岗位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锻炼，这比我在女师听那些枯燥无味的讲课，有不可比拟的痛快，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有魅力的吸引力。在这期间我为宁波学联写了不少函电与通报、文稿等等，进行宣传工作，因此遭到学校当局的歧视，在校内外宣布我为“过激派”（即共产党），他们在暑期内乘机进行压迫，勒令我登报申明退出宁波学联。校长施竹震召集全体教员开会，他以师长的尊严，厉声责问我是不是“过激派”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过激派，我只知道爱国。”他说：“我告诉你，过激派就是共产共妻的红党，你要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启事，申明退出学联，才能保得安全。”一个反动教员杨菊庭（大革命失败后

任鄞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立刻走到我的面前,拿出一个启事的底稿给我,并要我在上面签字,我早知他们的用意,连正眼儿也不一瞧,便回答说:“我是受全体同学的委托,被选举出来去参加宁波学生联合会的,不经全体同学开会讨论通过退出学联,我无权在这上面签字。现在同学们多放假回家了,开学以后再说。”这些话激怒了施竹晨、杨菊庭等人,他们怒目相视,威胁与劝说并进,要我签字,我置之不理,站起来走了。在我的身后响起一阵喳喳戚戚的评议,我连头也不回,一溜烟似地走到教室,仍然去写尚未写完的文稿去了,这是暑期中学联的一件重要工作。

“五卅”以后,在第四中学所发生的斗争也很激烈,这也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的尖锐斗争。当时四中的校长经子渊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人士,他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支持的,因此宁波反动学阀们恨之切骨,说经先生主张“共产公妻”,主张赤化。于是军阀便下令撤掉经校长的职务。国家主义派学生张锡炜,反动教员洪兆麟、冯纯官等幕前幕后进行“反经”活动。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拥经”运动,挫败了反动军阀与国家主义派的进攻。这场斗争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反映了第一次大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即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四中”的“拥经”斗争与女师同学反对退出学联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的,又与甬江、崇德女校学生离校斗争互相呼应。反动派在青年学生与爱国的工人、农民运动联合起来斗争的洪流面前,他们惊惶失措了。秀才造反,反动分子发抖了。

三、女师拒考风潮的失败

——“五卅”运动告一段落

暑假期间,女师等学校当局见学生联合

会仍然在活动,一时又无法瓦解它,于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密谋结果,决定开学后进行补考。人们都知道因为“五卅”运动期间学生全体罢课,并未上课,何用补考,所以一定要补考的目的想在分数上打算盘,对爱国学生扣除分数,不予毕业或留级,特别在品行分数方面大可以玩弄手段。学联早已知道各校反动当局在开学后一定要进行大整肃,所以暑假前夕已向各校发出了通知,要求废除补考。女师校长施竹晨最反动,最顽固,他同道尹、宁波镇守司等勾结一起,还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军警、国家主义派人士互相支援,偏要补考,我们坚决反对。女师反对补考问题发生后,施竹晨及其走卒们,纷纷出动,找我们几个为首的女生谈话,要求执行命令,我们不同意,各班级同学也都反对补考,学联也派代表到女师交涉,施竹晨避而不见,暗中进行迫害,由教员出面,要我们写“悔过书”。胆小者偷偷地写了悔过书,而多数同学不肯照办。学校当局则下令,全体离校,由家长带学生回家去。我们再三交涉,校方全然不理,最后只留下几十个最坚决的反对者不肯离校,继续斗争,校方认为这是“盘踞学校”、“进行捣乱”,成为政治问题了,于是施竹晨请来宁波府道尹朱文劬,教育厅厅长亲自出马,到女师挂牌开除了我们五个爱国学生,第一名当然是我,其次是方守娣,冯俞相,张宜文等四人。为什么开除几个学生要小题大做、惊官动府、弄得满城风雨呢?因为他们看到过“五卅”群众运动的威力,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认为学生人多,万一再发生全市罢课,事情就更糟了,因此不能不借军警、官府之势力前来镇压学生。道尹亲自到校来勒令开除我们的学籍,这使我们年轻一代尝到了血腥味。我们对付的方法是坚决抗拒,九月二二日举行罢课。宁波学联次日召集临时会议,进行讨论,主席是王安卿,记

录是袁古怀，发言者有李宪仲（烈士）、袁古怀（烈士）等，大家一致认为女师风潮是反动当局与爱国学生的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必须发动全市学生一致声援，举行总罢课，随即决定成立女师善后问题委员会，并提出下列的交涉条件：

1. 收回开除五位女师同学的成命；保证会后不得无故开除；

2. 不得进行补考；

3. 允许学生有自由组织学生会之权。

学联按此条件派代表到女师交涉，施竹晨均置之不理，不予接见；可见神气十足；何等骄横。进一步他还写了一个快邮代电（即勒电）发到各地，捏造事实，诬陷学生，为自己申辩。施竹晨亲自到道尹公署去报告了几次，他说：“本校的本科四年级生无端罢课，并胁迫二、三年级生一律罢课”，把事实颠倒了，说成“无故罢课”。他还把学联提出条件，说成是“结外援助”“聚众抗拒”。显然已把我们视同“捣乱分子”了。这样一来，急得道尹也害怕起来，只得呈报上级，当时军阀兼省长，要求查办。他以为这样一来，小小几个女学生，应当俯首贴耳听他的鬼话了，谁知初生之犊不怕虎，我们只有一颗纯洁的爱国心，别无其他非份要求，对于这样“无端”地被开除，且合法的交涉反被说成是“捣乱”，怎能信服？于是继续罢课，相持不下。九月二十八日，学联派了各校代表到女师交涉，要求其收回成命。道尹与县知事闻讯立即赶到女师，并偕同教育厅长一同前来，说什么校长执行考试是他的“教育方法”、“校内行政”，他校学生不得过问，“聚众抗拒”！

“为了维持国法，所以官厅要严加取缔”云云。

我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人，开除学籍无所谓，天下之大，何处不可以去求学；没有文凭，更是无所谓，为爱国而遭迫害，被开除

学籍，我反而感到光荣。因此挺身而出直趋这些豺狼之前，指责他们危言耸听，历诉他们镇压学生是非法行为，要求道尹“维持国法”，恢复学生会的组织，而且当面指责了施竹晨开除爱国学生有丧国家元气之罪责。这个老家伙平日盛气凌人，那一天只见他吓得面无人色，无词以对，低头不语，被在旁的教员拉进后面房子里去了。他也许以为我们人多，要动手打人，其实我们是一群有文化，有觉悟，有教养的爱国青年，我们是为真理而斗争，根本不想用拳头去征服对方，只有他们那些卑鄙的反动分子，根本无任何理由开除学生，所以准备欧打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调来保安队，全副武装，向我们示威。我们也不示弱，在痛斥了这群走狗以后，离开了学校，我们五人是被开除了，补考也没有进行，女师学生协会当然不准再存在，算是反动派暂时“胜利”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以女师拒考失败而告一段落。但这并非真正的失败，这不过是革命运动洪流的一个迴折而已。沙文汉同志当时在宁波甲种商业学校四年级肄业，他在“五卅”运动后曾有一首七言诗，表示他的感想。诗如下：一波未息一波生，要路多从险处争，百折千迴流到海，几时曾见大江平。他的二哥沙文求烈士（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参加党组织，广东暴动时任广州团市委的秘书长，领导广州暴动），非常欣赏他三弟的卓越才能，他看了这首诗后说：“他的深思远虑的气概，于此可见一斑”。这里可以看见在他的青年时代已有过人的识人能力，他们虽然都已离开了人间，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吧！

我被开除后，回到家里，母亲与姐姐当然十分同情，她们给我无比的安慰与鼓舞，好像打了一仗回来的战士一般，受到家人的抚慰，我丝毫也没有气馁，我觉得我的征途很长，前途与命运要我自己去掌握。不

久，我收到了裘古怀同志的信，信上打了许多问题（？）我不介意，但仔细看看，我悟到了他在对我说：我们为什么失败了，今后该怎么办？“五卅”后，他终于去广东，报考了黄埔军校，一九三〇年在杭州牺牲了，我也终于加入了共青团，真正成为“过激

派”，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了。我庄严地向女师同学们告辞，我相信在禁锢的牢笼会产生许多的革命的后来人。我们的革命意志是百折不回的，革命的洪流最后还是要流入大海的。

北伐前夕宁波学生“拥经亨颐”的斗争

周 闪 耀

(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宁波甲种商业学校的运动场上，搭起了戏台，召开该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晚七时，大会开始不久，有个省立第四师范的教师叫洪兆麟的，跑上台去，辱骂共产党，辱骂即将来任的第四中学校长经亨颐（即经子渊）。他骂经亨颐是“共人财产，共人妻子”的“赤化分子”；标榜自己是宁波教育界的元老，他代表宁波的教育界坚决反对经亨颐任四中校长。最后还大声疾呼说：“阿拉宁波人，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律反对，一律不要！”这是宁波反动派伙同封建势力攻击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第一声。

但是事态的进展，却不象反动派所想象的那样如意，在那年下半年，省立第四中学的校长经亨颐终于到校了。经校长是教育界的先辈，他曾任北京女师大的教务长，是杭州第一师范的多年校长，也是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经校长一到学校，在开学典礼上就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连年内战的北洋军阀的罪恶，毫无顾虑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状。并鼓励同学要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参加革命。最后，还提

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响亮口号。

自经校长来校开始，把宁波第四中学（在南门永宁桥）和宁波第四师范（在湖西虹桥头）两校合并起来，统称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学制也由第四中学的四年制和第四师范的五年制，改为六年制。但当时一般学校的改制，都是实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经校长认为国难当头，国家应早出人材，高中应分科培养专材。因此，他实行了初中二年，公共高中二年，分科高中二年的二二二制。经校长这一改制，得到学生们的热烈拥护。

在经校长来校后，他撤换了那些头脑封建，思想顽固的教师，聘请了朱自清、夏丏尊、汪子望、刘延陵、刘叔琴、郑鹤春、刘质平、郭伯宽等具有真才实学，具有救国抱负的教师。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成立了特委，经校长在宁波特委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学校中进步师生的合作下，大胆地发动师生宣传革命，积极鼓励学生上街去进行爱国活动。他不但允许同学在星期天可以上街宣传，还允许在星期三下午作为进行爱国活动的时间。记得那时有几个杭州的第一师范跟随经校长转学来四中的同学，如华少锋（即华岗）、李宪仲、吴谦等，他们是鼓动同学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对封建势力，宣传革命

的有骨气，也是在校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党团组织的先锋。从那时起，第四中学师生中的革命气氛不断高涨。一九二五年一月，是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一周年，学校中召开追悼大会。通过这次追悼会，全体同学进一步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久，学校中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响导》，中国共青团的刊物《中国青年》大量在学校中出现。（当时国家主义的刊物《醒狮》也一度在学校中推销，但它狭隘的国族主义思想为同学们反对，不久订阅的人逐渐减少，这一刊物在四中也就销声匿迹了。）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这几学期中间，学校还邀请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要人如胡汉民、沈定一等来校作报告。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宁波党组织邀请恽代英同志来宁波，他曾在宁波后乐园舞台进行多次报告，当时听报告的除许多小学教师以外，大多是第四中学的师生。恽代英同志这次报告，影响特别深远。此后，宁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就进一步扩大起来。

（二）

自从校长来四中以后，宁波的封建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经校长，反对他的办学方针，攻击学生思想“赤化”，不守校规，纪律松弛，行动越轨等。在这几年中，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占我国土地，杀害我国人民；南北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抢地盘、争势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候。广大工人与爱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决心。全国各大城市，都掀起了反帝、反军阀、抵制日货，驱逐英商等一连串的爱国运动。宁波学生联合会和爱国反帝等团体，也相继成立。

四中学生，在宁波学生会的领导下，今天搜查日货，明天斗争奸商。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宁波又掀起罢市、罢工、罢课，使日本货只好改头换面，贴出“德国制造”商标，英商“大英牌”、“强盗牌”卷烟只好改名为“白锡包”、“红锡包”。在宁波革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好形势下，宁波封建势力代表、反动文人学阀，如李琅卿（抗战开始。李在阅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后，政治态度有转变，声明拥护中央）、陈叔亮等，他们对这一大好形势，视同洪水猛兽，对第四中学学生的爱国行动，污蔑为“过激”。他们就结伙造谣，并向省教育厅控告经校长所谓“十大罪状”，要求省厅将其撤换。第四中学的学生、教师坚决拥护经校长，也公开在《宁波评论》、《火曜》、《青草》等刊物上揭露他们的阴谋，并联合进步士绅，推举师生代表赴省教育厅请愿，为经校长辩护和公开挽留。记得第一次赴省厅请愿的，由学生推选孙经文、吴文钦、干翔青和刘沧海为代表。那时省教育厅长是张闾生即张宗祥（一说是计宗颖）。四中学生代表由他碰见，因张闾生和经校长有师友关系，碍于情面，表面上说了一套好听话，说经校长德高望重，学有专长，政府将另有高位请就，至于四中校长的继任人选，可由经校长提出，省厅决无他意。代表回校后，向经校长汇报，经校长气愤地说：“闾生叫我走，我偏偏不走，我不是为恋栈，而是为了整个宁波地区的教育着想，为全校近千名师生着想。”

但当时教育厅长，既妒忌经氏的盛名，又要博取宁波封建势力的欢心，并打击师生的进步活动，所谓有“高位请就”，实为施了釜底抽薪之计，他们要送经校长一千元钱，要他去日本考察教育。对这一诡计，经校长心中完全明白，所以在经校长最后一次离校时，公开向师生表示，既不要这一千元钱，也不去日本考察，让教育厅撤我的职。

罢！经校长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离校后，教育厅当即派了一个叫范均之的来校代理校长，他一到学校，开除了一批进步同学，那些有声望的教师，也由于经校长离校，都辞了职。但是同学们反对封建势力的浪潮，不但没有熄灭，而且更汹涌澎湃，在整个学校中，不仅和范均之进一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还公开贴出了驱逐范均之，要求经校长继续来校的大字报，并组织更大的代表团，向教育厅再次请愿。教育厅长张宗祥，看到形势越来越严重，无法平息下去，只好乞灵于高压手段，叫宁波（会稽）道尹，勒令把四中解散。（这段情况参看当时四中出版的《青草》刊出的《四中解散后告宁波青年》一文）。

（三）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当教育厅将派法国留学生陈世觉任四中校长的消息传到后，同学们一面对经校长已无法挽留，感到惋惜，另一面又知道陈世觉是顽固的国家主义分子，激起了更愤恨的情绪，为此，大家都抱有破釜沉舟、不惜任何牺牲，给反动派一个迎头痛击的决心。九月初，学校开学后，同学们知道陈世觉不仅辞退了大批优秀教师，还安插了不少国家主义顽固派，如叶秀峰（以后是国民党的中统局局长），陈叔亮、陈孟夫、林本侨等。学校在开学前一天，还贴出了要同学们安分读书，严守纪律的布告。

开学的第二天，学校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陈世觉神气活现地大谈其曲线救国理论。他说：年青学生，幼稚无知，你们主要任务是埋头读书，不要空谈政治，更不应去参加爱国活动，被人利用，搅乱社会治安。至于研究政治，参加革命，要在大学毕业、留学回来后，才可以研究参加。还气势汹汹地提出所谓三条禁令：第一，平时不准出校门，假日出外也必须请假；第二，禁止参加社会活动；第三，如擅自外出

和参加社会活动者，则记大过一次，记三次大过的即行开除。对陈世觉的这种反动言论和高压手段，同学们听了很愤慨。当陈世觉报告一结束，吴谦同学立即跑上台去，针对陈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吴谦同学说：陈校长既然说青年学生不能谈政治，不准参加爱国活动，既然研究政治、参加革命要等大学毕业留学回来，那末陈校长已是堂堂留学生，请看他今天在这里是宣传革命还是压制革命，鼓励爱国还是反对爱国？陈校长还要把参加爱国活动的同学开除出去，这岂不是卖国光荣，爱国有罪了吗？这种谬论是使人难以忍受的。吴谦同学还没有把话说完，这位色厉内荏的陈校长涨红了脸，跑上台去，面羞交并，为了想挽救他的臭面子，声嘶力竭地向同学们说，谁反对我当校长，谁可以举起手来。他满以为这样可以压下同等的声势，但不料大家都以激昂的情绪举起了手，同时还高喊“不要陈世觉，要经校长！”这个时候，陈世觉已经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他的脸已变得灰白。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台下跑上去一个教师，这个人一面向同学们挥着手说：同学们，误会了，误会了，陈校长不是不要同学们爱国，不是……一面把陈世觉护下台来。这个教师是谁呢？就是新任的教导主任金海观。可是同学们还有谁会去听他的说教呢？早就一哄而散了。

一场尖锐的斗争，给国家主义分子陈世觉以沉重的打击而宣告胜利。当天下午，学校布告处贴出了开除吴谦等几个同学的布告时，这几个同学早已整好行装，作好准备。他们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走向新的战斗岗位。无数的同学们夹道欢送，在这悲喜交集的情景中，相互鼓励：“再见罢！同学们，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燃起更猛烈的战斗烈火吧！”

七九年九月

转载于《浙江革命史料特辑》（四）